



敦煌碑刻文献中的陇西李氏敦煌房

□ 李志鹏 李骅

李氏是中华民族姓氏中的最大姓氏,宋元以后李氏与张、王、刘、赵并列,为大姓。李氏子嗣历代生息繁衍,遍布天下。众所周知,历史上陇西李氏敦煌房在当地声名显赫、颇有威望,被誉为世家大族。唐朝时期,敦煌李氏家族更是势力雄厚,对于敦煌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一定的影响;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被誉为涅槃、净土的殿堂——莫高窟148窟,即为李氏家族雄厚势力和显赫声誉的遗留。

由此可见,敦煌李氏族人对于莫高窟的营造作出过贡献。此外,莫高窟大名鼎鼎的“李氏三碑”(《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碑》)及其他敦煌遗书资料,都是记载敦煌李氏世系及其社会活动的重要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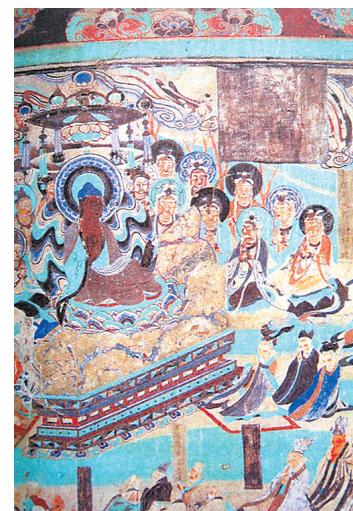
敦煌碑刻所见李氏得姓氏祖

关于李氏一脉的历史起源,在莫高窟发现的《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学界俗称《圣历碑》)记载:“李氏之先,出自帝颛顼高阳氏之苗裔。其后咎繇,身佐唐虞,代为大理。既命为理官。因而以锡其姓。洎殷之季年,有微字,德字灵,得罪于纣,其子理贞违难,避地居殷,食李以全其寿,因改为李。”《圣历碑》记载与传统史料中李氏得姓的记载内容相符,同时也佐证了早在隋唐时期,敦煌的李氏族人对于家族的历史来源就有了清晰的认识。

陇西李氏是唐代著名的“五姓七家”之一,陇西李氏著名的支系有四房:“其一曰武阳,其二曰姑臧,其三曰敦煌,其四曰丹阳。”而敦煌房是陇西李氏家族中声名显赫的支系,被唐代政府定为著姓,列入“人宗正寺”,



唐代《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



五代佚名《观无量经变》



唐代佚名《绿水青山图》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编入属籍。近年来,学者考证陇西李氏敦煌房的始祖是李陵后裔李贤、李穆,而非李嵩、李宝之后,二者虽源有异,确同为一族。而关于敦煌李氏的族系,敦煌文书及碑铭也有两种记载:一是西凉王李嵩之孙李宝之后;二是源于西汉李陵、李穆之后,而自称源于西凉王李嵩及其孙李宝之后的目的是为了攀附皇族,这与西凉王李嵩的世谱不符。因此,结合敦煌碑刻史料为研究陇西李氏敦煌房的社会关系提供了资料佐证。

陇西李氏敦煌房的社会影响

陇西李氏敦煌房人才济济、出仕入宦、成就卓著。据莫高窟所藏碑刻《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学界俗称《大历碑》)所载:“开土西凉,称藩东晋。咨议郎兴圣皇帝十三代孙。远派天分,世济其美,灵根地植,代不乏贤。六代祖宝,随便持节侍中西陲诸军事镇西大将军领护西戎校尉开府仪同三司沙州

牧敦煌公玉门西封邑三千户。曾王父达,皇敦煌司马,其后因家焉。王父操,皇大黄府军骑将军。烈考奉国,皇照(昭武校尉、甘州和平镇将)。”如文所录,早在东晋时期族人李嵩即以开土西凉,称藩东晋,建立西凉政权。

在后周和隋唐时期,李氏族人曾两度官居敦煌,并同索、张、阴、翟、曹等家族一起被称为敦煌当地的世家大族。其地位显赫、名人辈出,影响深远,并凭借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出仕入宦、营建佛窟,效忠于李唐王朝,一度控制张氏河西归义军政权。另据《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碑》即《乾宁碑》所载:“夫人南郡张氏,温和雅畅,淑德令闻,深尊陶母之仁,至切齐眉之操。先君归觐,不得同处于京华;外族留连,各分飞于南北。于是先兄弟丧,社稷倾沦,假手托孤,几辛勤于苟免。所赖太保神灵,奉恩剿毙,重光嗣子,再整遗孙。虽手创大功,而心全弃致。见机取胜,不以为怀。乃义立侄男,秉持旄钺,总兵戎于旧府,树勋绩于新墀。”学界研究认为张议潮在离开敦煌入驻长

安后,把归义军政权托付给了其弟张议潭之子,亲侄张淮深管理。张议潮死后,其女婿索勋悍然发动政变,杀张淮深全家,自立归义军节度使,并得到了朝廷的承认。李明振亦是张议潮的女婿,索勋篡权时,李明振已去世。李明振之妻,张议潮第十四女,因不满索勋大权独揽和飞扬跋扈,遂率领自己的三个儿子杀掉索勋,拥立张议潮之孙,侄男张承奉为归义军节度使,世事更替,实际上当时敦煌的李明振子孙是幕后操纵者,掌握着敦煌归义军政权的军政大权。

陇西李氏对于莫高窟营造的贡献

据著名敦煌学者史苇湘先生研究,唐朝时期,仅陇西李氏一脉曾在莫高窟开凿的洞窟就达七个。唐朝初年,国富民强、文化昌盛,作为丝绸之路重镇的敦煌,既是西域交通的枢纽,又是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大都会。凡是往来于丝路上的商贾、使节及僧侣,莫不以敦煌为集散地;凡中西文化交流,尤其

佛教东传,莫不以敦煌为中转站。这一时期,莫高窟的凿窟、修寺及其他佛事活动也空前高涨,其中陇西李氏开凿的、今编号为第32窟,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陇西李氏先后镌刻的三通石碑,即《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俗称《圣历碑》)、《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俗称《大历碑》)、《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碑记》(俗称《乾宁碑》),对敦煌历史变迁、民族融合、莫高窟兴衰及李氏世系等的研究和考证都具有极为珍贵的价值,也是研究陇西李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史资料。诚然,陇西李氏敦煌房在唐朝初、中叶和唐末为莫高窟的营造和敦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陇西李氏在莫高窟的营造中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后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作者单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本文为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敦煌哲学的内涵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1XZX014)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甘肃东南部的崇山峻岭间,西汉水与白龙江蜿蜒流淌,滋养着这片古老的土地。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已有人类繁衍生息。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在《甘肃史前考古报告》中详细记载了此地出土的大量彩陶、石器等史前文物,见证了文明的曙光。秦汉时期,这里成为氐羌民族的聚居之地,中央王朝先后设立“武都道”与“武都郡”进行治理。到了风云激荡的南北朝时期,氐族杨氏更在此建立包括“武都国”在内的多个地方政权。这三个以“武都”为名的行政建置,犹如三个历史坐标,标记着这片土地从秦汉到南北朝的政治变迁和民族融合。

从地名看陇南历史变迁

□ 李振华



青木川古镇

武都道:秦汉边陲治理的见证

“武都道”这一建置,最早见于汉初史料。《史记·高后本纪》明确记载:“武都道山崩。”班固在《汉书》中同样记录了这一事件,并特别注明“武都道属武都郡”。更为确凿的证据来自考古发现,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秩律》竹简中,在编号459(C220)的简文中清晰列出了“辨道、武都道、予道、氐道”等一系列道名。这些珍贵的文字记载,共同印证了汉初确实存在武都道这一建置。

值得注意的是,秦朝虽未直接记载武都道,但史学界公认“汉承秦制”的基本史实。秦朝在统一六国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郡县制行政体系。汉朝在立国之初,大多沿用了秦朝的行政建制。因此,学者普遍认为武都道的设置应当追溯至秦代。后晓荣在《秦代行政区地理》中通过详细的考证指出,武都道在秦和汉初确实存在,且隶属于陇西郡。刘琳在《华阳国志校注·汉中志》中也认为“武都疑县置”。

关于武都道的具体位置,《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其标注在今甘肃西和县东南,《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也记载其治所在今甘肃西和县南。这一考证结果已被学界广泛接受。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秦代设置的武都道与后来汉武帝设立武都郡时的武都县治所并非同一地点,这反映了不同时期行政中心的地理变迁。

武都郡:汉武帝开疆拓土的产物

武都郡的设置较武都道为晚,是汉武帝经略西南地区的重要成果。据《元和郡县志·陇右道》武都郡条记载:“元鼎六年开白马氐以其地以武都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遣中郎将郭昌、卫广征伐白马氐,在其故地设立武都郡。

《魏书·列传·氐》对此有更详细的记

载:“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三代之际,盖自有君长……秦汉以来,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汉武帝遣中郎将郭昌、卫广灭之,以其地为武都郡。”这段记载不仅说明了武都郡的前身是白马氏的聚居地,还揭示了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加强统治的历史进程。

在《汉书·列传·西南夷》中,我们能看到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以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黎郡,冉駩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这说明武都郡的设置是汉武帝在整个西南地区推行郡县制的一部分,是汉朝疆域扩展和行政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史记·秦本纪》中已出现“武都”之名:“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徐广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虽然这里记载的是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故事,但说明“武都”作为地名在秦代已经存在,且与“故道”并列,反映出这一地区悠久的历史渊源。

武都国:南北对峙中的民族政权

公元5世纪,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对峙时期。在甘肃东南、陕西西南与四川西北的交界地带,氐族杨氏先后建立了前仇池国、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和阴平国五个地方政权,武都国是其中之一。这个政权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却在南北对峙的复杂格局中扮演了特殊角色。

武都国的建立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据《宋书》等史料记载,元嘉十九年(442年),北魏大军攻破仇池,使得南朝刘宋的“汉中渐孤”。面对这一战略困局,刘宋政权迅速作出反应。元嘉二十年(443年)三月,宋军击败北魏驻军,同时利用氐族民众反对北魏统治的民族情绪,支持氐族豪帅杨文德建立武都国。

武都国以蒹芦(今甘肃武都外纳镇)为中心,其疆域“东据略阳,西界南坪,南有平武,北邻宕昌”,正好处在南北政权的交界地带。这个政权虽然仅存34年(443—477年),却是南朝对抗北魏的重要军事屏障。

陈金凤在《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中指出,武都国等民族政权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南北双方的力量对比,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地缘政治格局。武都国的建立和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北朝时期复杂的政治关系。

从武都道到武都郡,再到武都国,“武都”二字贯穿了这片土地近八百年的历史变迁。每一个名称背后,都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实体和治理模式,反映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动态调整。

武都道作为秦汉时期的特殊建置,体现了早期中央王朝对民族地区的治理智慧。在秦汉行政体系中,“道”通常设在民族聚居区,其治理方式与内地县制有所不同,显示出因地制宜的治理理念。

武都郡的设立,则标志着中央政权对西南地区的直接统治进一步加强。从汉武帝元鼎六年设郡开始,武都郡成为汉朝在西北边疆的重要行政区划,这一建置一直延续到魏晋时期。武都国的出现,既反映了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局面,也展现了少数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主性。虽然其存在时间较短,但作为氐族杨氏建立的五个政权中的重要一环,在陇南地区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

当我们追溯武都道、武都郡、武都国的历史轨迹,不仅是在梳理一个地名的变迁史,更是在解读中国西北地区民族关系、行政建置与地域开发的发展历程。这三个以“武都”为名的历史建置,如同三个时空坐标,帮助我们理解陇南大地从秦汉到南北朝的政治演进、民族融合与文化变迁。